

近代上海西人东来与海派文化的产生

凌唯淇

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 200433

摘要：随着清末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成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前来东方的西洋商人，传教士涌入租界与码头。他们带来的习俗，宗教，物什传入上海，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本地居民的衣食住行。为了容纳宽敞的西式轻便马车，英法租界内铺设马路；为了移民周日礼拜的习惯。天主教堂拔地而起……作者带着这一系列问题，以上海浦西为主要研究地区，走访上海历史博物馆，外滩十里洋场外国建筑群，走访各地调研。西人东来造成的不是上海的单纯西化，而是外国文化与当地习俗冲撞融合，形成了所谓“海派文化”。挖掘海派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对了解上海以及中国意义重大。

关键词：西方化；海派文化；近代化；开埠；上海

近代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开埠通商的口岸，也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介入，西方先进、文明、现代的城市建设设施和管理制度也随之进入上海。“工具的现代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和社会准则的现代化。”现代化思潮与上海本土的思想文化结合相融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最成功的地区与公民文化最强大的城市。近代上海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一个缩影。透过对上海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可以以小见大，管中窥豹地归纳总结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通过检索数据库与相关文献可知，学术界目前对于近代上海西方文化传入的研究基本完备。但是大多数成果着眼于微观的侧面，比如民国初年中西融合的婚纱，女子服饰或是住宅建筑风格等，缺少一个中观尺度的概述。这使得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犹如盲人摸象，只知其局部而无法洞悉其整体。本论文旨在以一个比较大的视角来分析上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至1943年收回租界100年间上海的西化过程、历史渊源、具体体现以及中西结合形成的海派文化。

一、西人东来与上海开埠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俄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渐渐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五口通商，即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上海相比于其他地区西化的领先在于上海的地域特殊性。洋商喜欢上海，说是上海人乐意做生意。上海

开埠后更多西人涌入上海，使得上海逐渐西化。旧上海（80-90年代）经历了列强的入侵，租界的兴起与西方人的流入。在此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外来西方文化的传入。上海县的部分居民，主动积极地接受东渐的西方文化，形成某些不同于传统的行为与思想，且积淀而成为新的习俗。

二、租界促进中西元素的交融

1843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英租界，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随即美法租界宣布二合一。

从一方面来看，西方列强设立租界的行为毫无疑问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与司法主权，对中国实现了文化侵略。但是与此同时租界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业提供了自由的言论空间，促进了文化交融与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上海得到飞速发展。一八七九年，工程师毕晓普在乍浦路用蒸汽机试验发电，点亮了路灯，和爱迪生在纽约试验电灯是同一年。一八八二年，中国第一座发电厂在南京路营业，比巴黎的第一座商业发电厂只晚了三年，和纽约的营业电厂几乎同时。在电气化时代，上海与全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西方城市花了二三十年建设的市政规模，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赶上了。以英租界最初范围，即外滩、洋泾浜、苏州河、河南路四至内的密集楼宇来看，不亚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线城市，这个时期的上海以独有的方式达成了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

1. 租界之行政及司法制度

英、美租界引进十九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制度，与界内华人共享。与封闭、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渐渐出现了现代法

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

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854年)英法美发起(后来法国退出)

法租界公董局(1862年设立)为法国自行设立。

会审公廨建立于1869年,对中国籍人士以及非条约列强国民有效,审理案件时有代表租界国领事的外国官员参与或“陪同”中国官员进行审判工作。实际司法权在租借国,是治外法权的一种延伸。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审官为中国人,由领事团推选懂中文而且受过法律教育的领事官或副领事官担任陪审官。

法租界会审公廨由上海道台或其代表会同法国领事或其代表共同审理案件。华人法官负责华人案件,法国法官负责外国人以及被外国人雇佣的华人

工部局和公董局都有市政府的性质,都采取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纳税人会议选举工部局和公董局成员,工部局和公董局负责市政管理(下设各个部门),会审公廨负责审理租界内华人和非条约国民的案件。工部局董事会作为工部局最高权力机构,主要通过定期召开董事会议对工部局重大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将所决定的事项交工部局具体办事机构执行。工部局的自治度更高,法租界常要受到法国领事影响较大。

2. 上海租界制度开启中国法制近代化

在中国还未出现近代法制的时候,中国租界法制便破土而出,然后才有清末的法制改革。因此,中国租界法制是中国近代法制的一部分,而且还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中国近代法制也逐步露出水面,首先是租界法制。这一法制的体系、制度、内容与语言等等,都具近代性,而与中国封建法制有天壤之别,性质完全不同。它最早产生于1845年的上海英租界,上海英租界法制是中国最早的租界法制。这一法制成为以后设立租界法制的示范,被其他租界所输入,成为自己的法制。这里包括了上海其他租界与上海以外租界。

中国租界的这种早期近代法制以城市区域法制面目出现,是近代中国城市区域中存在的近代法制。它给中国带来了法制的新气象,还不断拓展、延伸至城市中的华界,甚至使清末政府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法制,派官员在会审公廨出庭,聘用外国律师等。

20世纪初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进步主义风靡全球,正好也是上海开埠后国际化,奠定现代城市制度的时期。

因为租界制度的引入,上海与西方经济、文化、政治高强度交流。

三、西方文化浸润中上海城市近代化

传入上海地区的西方文化积淀在民间,于当时民生产生多元影响,以西方建筑为代表的十里洋场建筑群,以西方器用物品荷载传统习俗,使固有民情在物质内容上发生变化。西方花圃植物为园艺景观添美,食品水果丰富传统食俗,交通与医疗科技使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安稳,西洋报刊印刷是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开端。

上海的外侨中,俄国贵族与犹太人是特殊群体。欧美侨民大多在上海有属于自己国家的租界,在租界里无论是话语权还是经济水平都很高,俄国贵族与犹太人则大多为逃难的难民。上海是背井离乡的犹太难民们的避难所。从1933到1941年间,上海总共接纳了三万多名犹太难民。他们留沪期间造下的教堂、学校与医院,创办的报刊在上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俄国贵族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涌入上海租界避难。由于法国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于是俄难民多居住在法租界内。流亡而来的大多是贵族,其中有艺术家,舞者,彼得堡歌剧院的乐手。他们的到来将芭蕾与俄国文化传入了租界,增加了文化多样性。

1. 西方报刊的传入

自上海1843年11月开埠以来,商业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为传媒的兴起提供了适合的经济环境和文化土壤.西学东渐的特点是以科学知识和信仰的传播来互相促进。上海成为西方文化在华的交流中心,同时也开启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传媒之都的历史。

传教士报刊作为殖民主义者对华军事、经济、政治侵略的先锋武器,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其所宣传的西学,对于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人,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作为一支传载西方文化的重要力量,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报业和社会文化的近代化。

西方报刊为了迎合本地老百姓,游说其信仰基督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附会儒学。例如,英国传教士米怜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每一期的封面都印上“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字句。在文章内更是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贴近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儒家主流思想。刊物中宣传的道德原则和儒家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心思想为基督教义和儒家学说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不过刊物认为前

者比后者更好)。这样做，并不表明这些传教士真心崇奉儒学，而是显然出于宣传策略的考虑。他们很清楚：对中国人如此生疏的基督教义，如果不附会于中国传统的儒学，就很难被人接受。米怜曾有过坦率的自白，他说：“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即指、儒家）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好的效果的。”

2. 本地报刊中出现的西方色彩

耶稣会及其会士实践着西学东渐，在传教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新思想带入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取代香港成为办刊中心，出版报刊中较为知名的有《六合丛谈》《上海新报》等。此后，随着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传教士中文报刊出版事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并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鼎盛期。

文学

《新青年》1915年创办于上海，30年代海派作家群出现：

- 左联：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组成
- 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周瘦鹃
- 新感觉派：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 海派女作家：张爱玲、丁玲、苏青

海派文学（狭义上不包括左翼文学）的特点：大众化的新文学（言情小说占多数），反对宏大叙事，对都市生活既有欣赏，但同时也有作为他者的疏离感和幻灭感（描写大都市对人的异化和精神压迫）

科学

自上海开埠以来，商业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为传媒的兴起提供了适合的经济环境和文化土壤，当这个地球上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科学知识作为工具来改造生存环境和促进人类幸福的同时，此时在上海，伴随着近代工业化的萌芽和救国思想的兴起，也诞生了中国

近代史上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

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从事科学媒体的实践，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说明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精英小团体，更多的是面向中国的普罗大众，这使得自19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沪上科学媒体，逐步打破了由传教士和“舶来品”垄断的状态。

余论

罗兹·墨菲说：“就是在上海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并汲取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实力外交、租界居留地以及侵略扩张精神等一系列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就是在这个城市，西方文明特有的那种理性的、法制的、科学的、工业化的、高效率的和扩张主义的因素，与华夏文明固有的那些因循的、唯直觉论的、人文的、尚农的、低效率的和闭关自守的因素首度交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西化对于旧上海是现代化，进步的过程，不可否认，西方的理念，生活和商业模式等是上海的城市和文化的重要参照资源，它给我国的城市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新思路与理念。

参考文献：

- [1]《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陈忠.
- [2]《上海租界志》上海档案馆.
- [3]《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英）麦克法兰等著；王健译.
- [4]《点石斋画报》中国最早的旬刊画报，由上海《申报》赠送.
- [5]《海派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承》李天纲.
- [6]《上海史（第一卷）》兰宁，库寿龄著，朱华译.
- [7]《上海的外国人》.
- [8]《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 [9]《上海历史地图集》.